



告别中世纪

五四文献选粹与解读

袁伟时 编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告别中世纪

五四文献选粹与解读

袁伟时 编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GIP) 数据

告别中世纪：五四文献选粹与解读/袁伟时编著.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10

ISBN 7-218-04598-7

I. 告… II. 袁… III. 五·四运动—研究—文集
IV. K261.1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11729 号

选题策划	辛朝毅
责任编辑	余小华
装帧设计	张力平 阙文晖
责任技编	黎碧霞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印 刷	肇庆市科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31.25
插 页	1
字 数	550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5000 册
书 号	ISBN 7-218-04598-7/K·941
定 价	5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公司联系调换。

目 录

绪论 告别中世纪的思想革命

——新文化运动纵横谈	袁伟时 (1)
依据文献解读历史	(1)
什么是《新青年》的“修身治国之道”	(2)
最危险的是狭隘民族主义	(7)
“过激”思想的化解器	(14)
政治激进主义是反新文化运动的	(18)
思想家的失误与知识和制度缺陷	(22)

(一) 新文化运动的渊源

编者的话：历史不自今天开始	袁伟时 (35)
社会改良会宣言	唐绍仪、蔡元培等 26 人 (40)
社会改良会章程	唐绍仪、蔡元培等 26 人 (40)
新闻条例	秋桐 (章士钊) (42)
自由与出廷状	秋桐 (章士钊) (45)
古德诺与新约法	秋桐 (章士钊) (47)
开明专制	秋桐 (章士钊) (50)
神秘哲学	远 生 (52)
治官	远 生 (52)
国人之公毒	远 生 (53)
新旧思想之冲突	远 生 (60)

(二) 新文化运动的“修身治国之道”

编者的话：面对专制与分裂的追寻	袁伟时 (67)
社告	《青年》杂志 (73)
敬告青年	陈独秀 (73)
本志罪案之答辩书	陈独秀 (77)
本志宣言	陈独秀 (79)
吾人最后之觉悟	陈独秀 (80)
一九一七年预想之革命	高一涵 (83)
《新潮》发刊旨趣书	(86)
致《公言报》函并附答林琴南君函	蔡元培 (89)
洪水与猛兽	蔡元培 (94)
蔡子民先生逝世的感言	陈独秀 (95)
思想革命真是救中国的根本方法	张继 罗家伦 (97)
中国革命党应该补习的功课	陈独秀 (99)
新文化运动是什么?	陈独秀 (100)
新思潮的意义	胡 适 (104)

(三) 民主与“国情”

编者的话：国体、国情与现代国家	袁伟时 (113)
国体（答王庸工）	陈独秀 (119)
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	高一涵 (120)
袁世凯复活	陈独秀 (127)
答顾克刚（政治思想）	陈独秀 (129)
驳康有为《共和平议》	陈独秀 (130)
国会之用处在于捣乱*	陈独秀 (142)
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	李大钊 (143)
实行民治的基础	陈独秀 (146)

(四) 自由：观念、法律与制度审视

编者的话：百年一觉自由梦	袁伟时 (155)
宪法上的言论出版自由权	剑 农 (163)
对于《治安警察条例》的批评	高一涵 (169)
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	李大钊 (176)
警告守旧党	渊 泉 (178)
最近新旧思潮冲突之杂感	毋 忘 (179)
争自由的宣言	胡 适 李大钊 高一涵等 (180)
司法独立与教育独立	若 愚 (182)
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	蔡元培 (185)
法律与言论自由	陈独秀 (187)
自由与秩序	李大钊 (187)
“危险思想”？	赤 (189)
读弥尔的《自由论》	高一涵 (190)
批评的研究	
——三 W 主义	罗家伦 (193)
中华全国报界联合会致国务院函	(196)

(五) “堂堂正正以个人主义为前提”

编者的话：冲破“国家”神话桎梏	袁伟时 (201)
人生唯一之目的	李亦民 (204)
国家非人生之归宿论	高一涵 (209)
非“君师主义”	高一涵 (214)
坚守“个人与社会宣战主义”	
——答孔昭铭	陈独秀 (218)
“易卜生主义”	胡 适 (218)
不朽	
——我的宗教	胡 适 (229)

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	胡 适 (235)
万恶之原	孟真 (傅斯年) (242)
个性主义与个人主义	蒋梦麟 (245)

(六) 中国女人的基本权利

编者的话：从“不缠足”到“女权”	袁伟时 (249)
李超传	胡 适 (251)
贞操问题	胡 适 (258)
女权与法律	朱 洪 (265)

(七) 古今中西文化的辩论

编者的话：对冲击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误解	袁伟时 (273)
东西民族根本思想的差异	陈独秀 (282)
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	陈独秀 (284)
宪法与孔教	陈独秀 (286)
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	陈独秀 (290)
无论何种学派，均不能定为一尊	吴 虞 陈独秀 (295)
再论孔教问题	陈独秀 (296)
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	吴 虞 (299)
孔教	俞颂华 陈独秀 (301)
随感录	鲁 迅 (304)
迷乱之现代人心	伦父 (杜亚泉) (307)
质问《东方杂志》记者	
——《东方杂志》与复辟问题	陈独秀 (311)
答《新青年》杂志记者之质问	伦父 (杜亚泉) (315)
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	陈独秀 (318)

(八) 文学革命

编者的话：文学革命与“反传统”的是是非非	袁伟时 (329)
文学改良刍议	胡 适 (335)
文学革命论	陈独秀 (341)
“尝试”与“不容匡正”*	胡 适 陈独秀 (344)
历史的文学观念论	胡 适 (346)
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	胡 适 (348)
人的文学	周作人 (354)
思想革命	仲密 (周作人) (359)

(九) 科学与思维方式变革

编者的话：奴性·理性·现代性	袁伟时 (363)
论“奴性的逻辑”	胡 适 (366)
学术三戒	陈独秀 (367)
偶像破坏论	陈独秀 (368)
圣言与学术	陈独秀 (370)
何为科学家?	任鸿隽 (370)
什么是科学方法?	王星拱 (375)

(十) 多元文化的自由论难

编者的话：社会公正、民族文化与现代化的张力	袁伟时 (381)
战后之世界潮流	李大钊 (守常) (387)
国民思想与世界潮流	许德珩 (389)
社会革命——俄国式的革命	孟真 (傅斯年) (398)
新时代之青年	章行严 (士钊) (399)
突变与潜变	东 荪 (404)

《改造》发刊词	梁启超 (406)
欧洲文化之危机及中国新文化之趋向	张君勱 (408)
宇宙革命的预言 (选录)	朱谦之 (414)
评提倡新文化者	梅光迪 (419)
论新文化运动	吴 宓 (423)

(十一) 五四：从爱国激愤到制度寻思

编者的话：爱国·法治·公民社会	袁伟时 (437)
一周中北京的公民大活动	亿 万 (444)
青岛交涉失败史	涵 庐 (448)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之示威运动与国民之 精神的潮流	顾兆熊 (451)
论学生事件	梁漱溟 (453)
评梁漱溟君之学生事件论	知非 (蓝公武) (454)
市民运动的研究	北京《晨报》 (456)
学生事件和国家法律的问题	北京《晨报》 (458)
学生无罪	陆才甫 (459)
学生示威感言	天 侔 (462)
大总统果欲置学生于法耶	竹 宣 (463)
活法律与死法律	少 少 (464)
民众运动的目的	涵 庐 (465)
北京学生界宣言	(467)
上海学生联合会宣言	(468)
国民外交协会宣言	(469)
山东省议会等要求偿款废约收回山东权利电	(471)
北京市民宣言	(472)
吴佩孚等要求释放学生公布外交始末电	(472)
上海商工学报各界对外宣言	(474)
熊希龄等复钱总理函	(474)
张謇致徐总统电	(475)

康有为痛斥国贼通电	(476)
唐继尧主张直接收回青岛电	(477)
“五四运动”的精神	毅 (罗家伦) (478)
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什么?*	
——在中国公学第二次演讲会上的演词	陈独秀 (479)
编后絮语	袁伟时 (481)
跋：回答对新文化运动的三大责难	
——献给五四 85 周年	袁伟时 (487)

绪论 告别中世纪的思想革命

——新文化运动纵横谈

袁伟时

“五四”80周年前夕，友人小胡过访。陋室请茶，放言无忌。歧见新声，错杂纷陈。乍暖还寒之际，似可消愁解闷。当即整理成这篇近三万字的文章，几经周折，后来在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办的《黄河》杂志2000年第4期刊出。时序更新，转眼五年过去，又值85周年，更不时有幸聆听时贤高论，在迭获教益的同时，不敢苟同之处颇多。其中最值得重视的是2004年2月21日朱学勤兄在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上讲了新文化运动与文化革命等问题，有位热心人将讲稿发来给我，拜读后有些感想，一言难尽，特草就一文略陈浅见，并充跋文。除此之外，重温旧话，敝帚自珍，全文不加修正，再呈新旧读者朋友。

2004年3月29日

依据文献解读历史

胡：这几年，谈新文化运动的文章很多。今年是80周年，更加热乎。一碗冷饭，炒来炒去，有多大意思？

袁：不能一概而论。不少文章看看标题就够了。但有的文章确实下过功夫，即使错了，也是“片面的深刻”，启迪思考，功不可没。问题不在文章多少，而在有的人连最基本的文献都没有读过，却在那里大发议论。其中最恶劣的还以正宗王麻子自居，气势汹汹，既讨厌，又恶心。不过，你要是为此类学风、世风生气，那就上了大当。这类景象，哪个朝代没有？躬逢盛世，饱览奇观怪事，别偷懒，勤记录，说不定那一天你也能写部小说，比



“五四”期间北京各校学生在天安门广场集会。



1919年5月5日《新申报》号
外报道“五四”游行情况。



冯骥才的《三寸金莲》还要引人入胜。

支持新文化运动的报刊很多。以期刊来说，影响最大的有《新青年》、《太平洋》、《每周评论》、《新潮》、《国民》、《新教育》、《星期评论》、《少年中国》、《建设》、《解放与改造》、《少年世界》等11种。^① 加上《晨报》和《晨报副刊》、《时事新报》及其副刊《学灯》、《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等等，声势非常浩大。新文化运动提倡什么、反对什么，都体现在这些出版物中。这个运动有

有关问题的答案，也只能在这些出版物特别是公认领袖群伦的《新青年》中寻找。

要了解历史真相，还是要从文本出发，搞点本本主义。直接读点当时发表的文献资料，比花时间去读那些三四流的八股文章，损益不啻天壤。

什么是《新青年》的“修身治国之道”

胡：老兄有点危言耸听吧？新文化运动追求的是民主与科学，妇孺皆知，有什么疑问？

袁：任何口号都是化简了的符号，还要有必要的阐释，才能准确表达它的内涵。民主与科学是1919年1月提出的，它确实概括了这个运动的重要指导思想。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1915年9月出版的《新青年》创刊号（《青年》第1卷第1号），那里说的是“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② 在说人权与科学、民主与科学两个口号的联系与差别之前，还要注意一件事，这个刊物从创刊之日起，长期刊出一页《社告》，开宗明义便说：“本志之作，盖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③ 这个修身治国之道，就是新文化运动的基本诉求，值得认真追寻。

胡：他们所说的“道”，无非是西化或全盘西化之道。

袁：世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不要用什么“全盘西化”吓唬人，何况西或中本来就不应是判别是非的标准。

“今后时会，一举一措，皆有世界关系。我国青年……不可不放眼以观世界。”^④ 摆脱民族

① 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47～248页。

② 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

③ 《社告》，《青年》第1卷第1号。

④ 《社告》，《青年》第1卷第1号。

和国别的局限性，用世界眼光观察一切。我想，这是他们的修身治国之道的出发点。如果固守民族性，那就要像义和团某些做法一样把任何沾点洋气的东西统统烧掉，什么自由、平等、民主……全都是妖言惑众。

这个修身治国之道的核心是对个人自由的追求。陈独秀办《青年》杂志，头篇文章（也就是通常说的发刊词吧）《敬告青年》的第一条便是大声宣告：“等一人也，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奴隶云者，古之昏弱对于强暴之横夺，而失其自由权利者之称也。自人权平等之说兴，奴隶之名，非血气所忍受。”^① 说“科学与人权”，显然把自由摆在首位。任何国家、任何民族走出中世纪的基本内容都是挣脱有形无形的镣铐，让公民得到充分的自由。争取和维护人权的崇高和漫长的历程，正是以此为背景和起点的。而科学正是砸破精神枷锁，扩大自由度的工具。用民主取代人权为基本口号的时候，自由——人权依然是思虑的中心。民主的基本职能就是保障公民的个人权利（人权）。“五四”爱国运动期间，陈独秀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提出的五项要求之一，是“市民须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② 稍后，谈到“政治的民治主义”的时候，他又重申：“我们既然是个‘自由民’不是奴隶，言论、出版、信仰、居住、集会这几种自由权，不用说都是生活必需品。”^③ 与此同时，他们对从宪法到各种法令（如《治安警察条例》和出版法令等）有碍自由的部分，都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对于种种否定自由的错误言论（有碍秩序、传播危险思想等等）也一一据理反驳。胡适、李大钊、高一涵等人还联合发表了《争自由的宣言》。

不言而喻，他们说的自由指的是个人的自由。《新青年》从创刊之日起，一再发表文章，解释国家、政府、个人三者的关系，归结到一点，是要“堂堂正正以个人主义为前提”。^④ 在陈独秀看来，现代公民与奴隶的差别，在于后者“不以自身为本位，则个人独立平等之人格，消灭无存”。^⑤ 所谓“以自身为本位”和人们的口头禅“个性解放”，其实说的都是个人主义。国际学术界通用的概念“个人主义”和中国马克思主义文献中以自私自利



“五四”时期的陈独秀。

① 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

② 陈独秀：《北京市民宣言》，《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三联书店1984年，第425页。

③ 陈独秀：《实行民治的基础》，同上第430页。

④ 李亦民：《人生唯一之目的》，《青年》第1卷第2号。

⑤ 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第1卷第1号。

为内涵的个人主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混淆，以免闹出不应有的笑话。自由和个人主义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奇怪的是，时至今日仍有学者断言新文化运动不重视争取自由。这大约是不熟悉当时的文献造成的误解。尽管当时言论空间的宽阔在20世纪中国罕有其匹，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仍为此不断呐喊。是不是他们不关心经济自由呢？当时实行的是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官僚资本的力量不大。政府是软弱的，对市场干预不多。妨碍市场扩大的是军阀兵戎相见，破坏了社会的正常秩序。也就是说，焦点集中在政治问题上。面对这样的社会环境，陈独秀没有忽视经济自由（独立）是个人独立自由的基础。他说：“现代生活，以经济为之命脉，而个人独立主义，乃为经济生产之大则，其影响遂及于伦理学。故现代伦理学上之个人人格独立，与经济学上之个人财产独立，互相证明，其说遂至不可摇动，而社会风纪，物质文明，因此大进……西洋个人独立主义，乃兼伦理经济二者而言，尤以经济上个人独立主义为之根本也。”^① 海内外有不少人为中国知识阶层独立人格沦丧而悲愤，读一读陈独秀的这段话也许会有所启示。

还有一点不应忽视：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和参与者十分关注保障自由的制度建设。司法独立、教育独立、舆论独立、少数人的权利、公民权利的宪法保障，如此等等，反复申辩，反复追寻，从而赢得广泛的认同。当时敢明目张胆站出来反对这些现代观念和现代制度的人不多，尽管他们实际信奉或推行的可能仍是专制主义那一套。

新文化运动，本是关心国家命运的有识之士为巩固和挽救民主共和制度而掀起的思想补课。民国元年2月，袁世凯接替孙文出任临时大总统的前夕，唐绍仪、蔡元培、汪兆铭、宋教仁等26人，发起组织社会改良会，基本宗旨是“以人道主义去君权之专制，以科学知识去神权之迷信”。^② 这宗旨和其章程中力倡的“财产独立权”、“个人自立”、“实行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和“改良戏剧及诸演唱业”等主张，均为新文化运动所继承。“数年以来，创造共和再造共和的人物，也算不少。说良心话，真心知道共和是什么，脑子里不装着帝制时代旧思想的，能有几人？”^③ 面对如此悲惨的现实，陈独秀深深感到“要帝制不再发生，民主共和可以安稳……非先将国民脑子里所有反对共和的旧思想，一一洗刷干净不可”。^④ 洗刷的基本方法之一，是灌输宪政和法治的基本知识，为谋求个人自由的制度保障奠定思想基础。

简单地说，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把自由和民主看作是密不可分的。没有充分的自由不可能

① 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社会》，《新青年》第2卷第1号。

② 《社会改良会宣言》，《蔡元培全集》第2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0页。

③ 陈独秀：《旧思想与国体问题》，《新青年》第3卷第3号。又：此说并无夸大之嫌，参阅拙作《孙文在辛亥革命后第一个十年的迷误》可见一斑。

④ 陈独秀：《旧思想与国体问题》，《新青年》第3卷第3号。

有真正的民主；而作为民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的法治和宪政，又是自由的基本保证。无论是以人权和科学为基本口号，还是1919年1月开始代之以民主和科学，这些要求都没有改变。否定“旧政治（特权人治）”，确立法治、宪政，是这个运动不变的基本诉求之一。

至于他们倡导的科学，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思维方法的变革，让中国人从以圣贤、经典和尊长的是非为是非的“奴性逻辑”中解放出来，树立理性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二是揭穿各种“灵异”和迷信等欺世惑民伎俩，普及科学常识。归结到一点，无非力图让中国人凭借理性和良知自由地思考。

胡：照你说来，当时提出人权和民主的基本要求是自由、法治、宪政；科学则是理性为核心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简单点说，自由、法治、宪政、理性就是新文化运动的基本诉求。听起来言之成理，但没有消除我的疑虑。疑问之一是你是不是把新文化运动政治化了？

袁：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曾以“不谈政治”相标榜。可是，不谈政治，何来“治国之道”？这不等于他们说了假话。所谓“不谈政治”，意思是不直接评论时政，而冀图通过学理的灌输，从根本上提高中国的公民自觉。与此同时，也不排除在特定情况下，用适当方式对重大的政治问题作出直接的回应。

看一看《青年》杂志的创刊号吧。当时正值袁世凯大发皇帝梦，其爪牙四出奔忙和鼓噪。陈独秀的《敬告青年》与高一涵的《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在痛陈公民素质的根本要求之时，明确宣告：“无论何国，苟稍顾立国原理，以求长治久安，断未有不以民权为本质。”^①这当然是有所指而发，迎头痛击帝制逆流。他们意犹未尽，还以答复读者来信和国内大事记的形式，一一驳斥筹安会宣扬的恢复帝制的谬论，尖锐地揭露了企图改变国体的荒唐。此后，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与康有为、杜亚泉、林纾等人的辩难，都没有离开一个中心：他们的主张是不是符合民主、宪政的需要？这表明，从一开始新文化运动就没有回避政治。

准确点说，新文化运动是为挽救民主共和制度而开展的启蒙，是为告别中世纪而进行的思想革命。除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一类由外来移民为主体组成的现代国家，任何国家要走出中世纪都必须经历这一场思想革命，重演西方的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这场革命——人的解放如果不彻底，轻则让本国人民在炼狱中爬行百年，中国是其中典型；重则给整个世界带来莫大的灾难，这就是德国和日本反人类罪行的祸根所在。

胡：几个书生，几份破报刊，有那么重要吗？中国的事还是要靠枪杆子。

袁：枪杆子要由人掌握，人的行动则由思想支配。当时的枪杆子可不少，最显赫的是两部分。一是段祺瑞领导的北洋军。他掌握着中央政府的实权，主张武力统一全国。另一是南方的

^① 高一涵：《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青年》第1卷第1号。



1916年12月26日黎元洪总统
任命蔡元培为北大校长。

孙文及其地方军阀盟友，即所谓“西南（包括现今通常说的西南、华南两地区）政府”，多数主张“联省自治”，孙文坚持的则是“北伐”，也冀图用武力统一全国。西南军阀打着“护法”的旗号，实际干了不少违法的勾当。弄到后来，连孙文也不能不叹气：“南北如一丘之貉。”这些枪杆子只能乱国扰民。

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力图开辟另一条救国道路。这就是向中国人灌输现代公民和现代国家的基本观念：自由、法治、宪政、理性……帮助中国人摆脱以三纲为核心的中国传统的中世纪意识形态的束缚，为建立真正的民主国家奠定牢固的思想基础。与此

同时，他们秉着自由主义的理念，为公民权利特别是学术、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而抗争，发表《争自由的宣言》，要求废除《治安警察条例》，紧密注视《宪法》修订过程……努力在现有的基础上，扩大自由空间，逐步推进法治和宪政。

胡：这不是与虎谋皮吗？

袁：那时不是黄金时代，但又确实是20世纪中国公民自由空间最大的年代。以蔡元培整顿、改造北京大学为起点，我国的高等学校开始在精神和制度上与国际公认的标准（教育独立、学术自由）接轨。章太炎的大弟子黄侃放言“八部（他所治的八部书）之外皆狗屁”。胡适、陈独秀大反纲常名教、“奴性逻辑”。李大钊等人宣扬布尔什维主义。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青年——朱谦之则在大骂老师陈独秀是“专制魔王”之余，抛出一本又一本自己的哲学著作：《革命哲学》、《无元哲学》、《一个惟情论者的宇宙观及人生观》等等。

思想和学术自由不但为学术繁荣和文化更新创造了前提，也为社会精英乃至广大公民积极参与公共生活创造了条件。据研究五四运动史的名家周策纵教授估计：“‘五四’时期，即1917到1921年间，全国新出的报刊有1000种以上。”^①也发生过封报和捉拿编辑记者的野蛮事件，但创办新报刊相当容易。总的说来，言论是自由的。知识阶层和普通公民不但可自由发表自己的政见，而且言论自由的物质保证也比较充分。几个大学教授凑在一起，拿出月薪的一个很小的部分就可以创办一个刊物。

结社也是自由的。知识阶层的大小组织真是多如牛毛。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商人自己的组织——商会发展很快。戊戌前后，清政府已经认识到要发展工商业，就必须鼓励工商业者成立自己的组织，维护自己的利益，协同解决发展中的困难。到辛亥革命前夕，已有大小商会近千个，且以每年百个左右的速度继续增加。这些商会不是某个党派的工具，确实是工商业者自主

^① 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47页。

组织的团体。他们经常对涉及自己利益的种种事情——内政、外交、立法和社会问题等等发表声明、通电，表明自己的态度。有的还出版报刊。针对兵匪横行的状况，不少商会还拥有自己的武装——商团。

简单地说，当时，在中央政府和地方军阀的统治之外，已经形成了多元的颇为强大的民间社会力量。他们有较宽广的自由活动空间，成为牵制和监督各级统治者的不可忽视的力量。

世界各国的历史表明，一个强大的独立于政府以外的民间社会的存在，是民主、法治赖以运作的重要基础，也是公民自由的重要保证。只要稳步地发展已显示其勃勃生机的民间社会，更广泛、深入持久地推进新文化运动，完成思想观念变革的历史任务，推动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变革，人权、民主、科学在中国生根并不是不可能的。

不要小看思想观点和思维方式变革的意义。“人是观念的囚徒……真正的革命发生在人们的头脑中，这就是观念的革命。观念革命是对既定价值的一次全面再评判，它把人的精神从旧思想的樊篱中解放出来，引入一个崭新的世界。可以说，是观念革命造就了人的更新。”^①任何国家要走出中世纪，实现现代化，关键在于观念变革，造就一代新人。

新文化运动提倡的人权、民主、科学其实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具有普世价值。不能把它们看作现代西方特有的价值观，任何国家要实现现代化，都不能不接受人类文明的这些共同成果。中国人要分享这些成果，当然要致力于制度的革新和建设，但其前提则是切实推进观念变革，新文化运动承担的就是这个历史任务。

控诉和发泄对外来侵略者的怨恨是容易的。困难的倒是中国人能不能冷静地扪心自问：为什么观念变革的历程如此艰辛，一再延误现代化的进程？

最危险的是狭隘民族主义

胡：不少人指责新文化运动是“全盘西化”、“全盘反传统”，听老兄这么一说，真有点这样的味道了。

袁：古往今来把自己不喜欢的思想者置之死地的伎俩之一，是把对方说成是魔鬼，从而恣意宰割就有充分的理由了。民族感情是非常复杂又最容易失控的情绪，一个有高度责任感而又有深远眼光的知识分子或政治家，一定要冷静慎重地处理好这个问题。19、20 世纪中国吃大亏的原因之一，就是让狭隘的民族情绪遮蔽了自己的眼光。一句“不准以夷变夏”，可把 19 世

^① 钱满素：《爱默生和中国——对个人主义的反思》，三联书店 1996 年版，第 1 页。